

# 工作动态

## 第二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召开

### ——浙大中古汉语研究引人瞩目

由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25日在杭隆重举行。来自日本、韩国、法国、挪威、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外四十多所高校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的六十多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汉语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课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和国内外著名汉语史研究专家丁邦新、何莫邪、蒋绍愚、项楚、鲁国尧、吴金华等出席研讨会，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田敬诚副处长到会讲话，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致开幕辞。张书记在致辞中提出，希望通过若干年的建设，使汉语史研究中心成为整体研究水平居于国内外前列的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及资料信息中心。

汉语是世界最发达、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也是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它为汉族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统一进步、为汉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对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汉语史的研究，了解汉语的今天、昨天和前天，将有利于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增进国际交流服务。

以中古近代汉语研究为特色的汉语史研究是浙大的传统优势学科，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等老一辈学者为这一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姜先生的《楚辞通故》、《瀛涯敦煌韵辑》，蒋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义府续貂》，郭先生的《训诂丛稿》、《训诂学》，都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崇高的赞誉。尽

管三位先生已经谢世，但沿着他们开创的道路，我校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崛起。他们学风严谨，基础扎实，学术思想活跃，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在中古近代汉语研究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为使老一辈学者开创的学术传统得到发扬光大，促进与海内外的学术交流，提高我校汉语史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和地位，1998年，新成立的浙江大学把原杭州大学等四校从事汉语言研究的力量联合起来，成立了汉语言研究所。1999年10月，又组建成立了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去年被批准成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这些都为我校今后的汉语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研讨会期间专家学者还参观了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并对中心良好的研究条件和引人瞩目的成果倍加赞赏。

研讨会期间还举行了原杭州大学教授、已故著名语言学家蒋礼鸿先生的《蒋礼鸿集》出版座谈会。

此次会议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浙江教育电视台9月24日的《走进今天》大型新闻栏目、杭州日报9月29日第2版、浙江大学报、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都对此作了报道。

## 第二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01年9月25日至27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有7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学者参加会议或提交论文。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等几所院校的数十名研究生列席会议并提交论文。25日上午举行开幕式，由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张涌泉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致开幕辞，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研究员分别代表海内外学者讲话，浙江大学方一新教授代表汉语史研究中心致欢迎辞。开幕式后，在北京大学蒋绍愚

先生主持下，丁邦新、江蓝生、挪威奥斯陆大学何莫邪三位先生先后作了大会报告。大会报告之后，方一新教授主持了《蒋礼鸿集》出版座谈会。26日下午举行第二场大会报告和闭幕式，分别由何莫邪教授、项楚教授和蒋绍愚教授主持，蒋绍愚、鲁国尧、吴金华、刘广和教授先后作大会报告，中心副主任王云路教授作大会总结。

本研讨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内容广泛深入。提交的论文，无论是词汇、语法，还是音韵，都有较多的数量和较高的质量。在大会开幕式上，丁邦新教授对这一点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鲁国尧教授在小组讨论时也指出，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音韵方面的论文呈现出可喜的局面，使这次研讨会成为真正的“世界贸易组织”。同时，运用新的语言学理论来研究中古汉语、使得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汉语史的传统相结合等也受到重视。

二、材料运用更为广泛。中土文献、汉译佛经以及二者的结合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同时，海外的汉语文献都得到充分的重视，如日本的石塚晴通先生提交了《从敦煌文献及日本训点资料中得到的中古汉语研究的新成果》一文，就是利用流传在海外的汉语文献为研究中古汉语提供佐证。而韩国金泰完先生的《〈鸡林类事〉和韩国中世高丽语的声母系统》一文，则提出了“用《鸡林类事》，能够构拟韩国中世语音，而且能够构拟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的观点。

三、宏观微观并重。在提交的论文中，宏观的汉语史分期问题仍旧是一个讨论的焦点。在热烈的讨论之后，大家原则上达成共识：在现阶段，语音史、语法史、词汇史有独立研究的必要，研究深入之后再综合研究。另外对词汇理论也作了探讨。同时，微观的个案分析也相当深入。单个词语的考释、某一种词汇现象的分析、某一种句法结构的研究以及音韵方面的一些现象等，都有比较深入的探讨。

四、这次大会也是一次学术信息互相沟通的大会。开幕式上，丁邦新教授介绍了海外汉语的研究状况。闭幕式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的汉语史研究概况。

本次大会向我们展示了中古汉语研究的光辉前景。不仅是研究范围有了进一步

的拓展、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研究课题不断深入，更有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有多位在校研究生列席会议并提交了质量不错的论文。

本次学术研讨会共有两场大会报告，两组八场小组讨论，与会代表有机会就提交大会的论文发表意见，展开讨论。

## 《蒋礼鸿集》出版座谈会纪要

9月25日上午，《蒋礼鸿集》出版座谈会在位于西子湖畔的新新饭店举行。参加座谈会的有出席第二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全体专家学者，浙江省出版总局高海涛副局长、浙江教育出版社骆丹社长、徐忠良副总编、王翼奇编审、《蒋礼鸿集》的责编郑广宣编审。座谈会由蒋礼鸿先生的学生、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主持。座谈会上，编委会代表祝鸿熹教授、出版社代表长骆丹编审、家属代表盛静霞女士以及浙江大学兼职教授暨汉语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北京大学教授蒋绍愚、南京大学教授鲁国尧、四川大学教授项楚、复旦大学教授吴金华等先生先后发言。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祝鸿熹先生谈了《蒋礼鸿集》的出版缘起。在蒋先生的论文中，有一些文章是应人之邀，发表在一些小刊物上，其中不乏精品，但现在已不容易找到；而以前出版的专著，因年代久远，有的也难以寻觅。因此，整理、出版《蒋礼鸿集》是非常必要的。教育出版社骆丹社长从出版社的角度介绍了出版《蒋礼鸿集》的过程和有关情况。蒋先生的遗孀盛静霞先生回忆了蒋先生辞世前夕，仍念念不忘读书，挂念《〈类篇〉考索》等书的修订，挂念那些未整理完的手稿。盛先生对《蒋礼鸿集》的结集出版表示由衷的欣慰和感谢。

几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分别从自己与蒋礼鸿先生的交往和自身的学术之路谈起，对蒋先生宽广的学术视野、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宽于待人、严于律己的道德风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先生从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燕

子赋》两种校注》的写作谈起，对蒋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在论文写作方面给自己的启发指导作用念念不忘，对蒋先生连续五次修订该书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感佩不已。

北京大学教授蒋绍愚先生是原杭州大学中文系著名学者蒋祖怡先生的长子，自幼生长在杭州，曾与蒋先生一家比邻而居多年。回想往事，蒋先生勤于治学的形象历历在目。蒋绍愚先生说，在蒋先生谢世之后，杭州大学曾编辑了《书魂》一书纪念蒋先生，这“书魂”二字就很好地概括了蒋先生的一生：“书”指蒋先生的学问，“魂”指蒋先生的精神。蒋先生的学问成就，不仅表现在对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有很高的造诣，而且表现在开创了汉语史研究的新领域——敦煌语言文字学，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蒋先生对学问的精益求精，对学生、同仁宽厚有加，对自己则严格要求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好好地继承与发扬。

南京大学教授鲁国尧先生对蒋先生的“道德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鲁先生指出：蒋先生的“文章”，即学术成就，自不必言；而蒋先生的“道德”，即为人治学的态度，更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他回忆自己1974年到上海，参加《辞海》的编撰修订工作，与蒋先生共同工作了一个月，说当时真是受益非浅。在相处的这一个月里，蒋先生对他和其它后学关怀有加，多有切磋请益之乐，在自己返乡时，蒋先生送别的情形，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四川大学教授项楚先生，以《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等高质量的著作为学界称道。项先生回忆自己当时从改造思想的农村回到学校，参加《汉语大字典》的资料整理工作，在阅读敦煌文献时，主要的参考书目便是尚未修订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部书为自己阅读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后来蒋先生又亲自寄书给他，这种谦逊、宽厚的大家风范，令他难以忘怀。

复旦大学吴金华教授，是著名语言学家徐复先生的高足。当年在徐复先生门下研读时，徐复先生对好友蒋礼鸿先生的学问人品极为赞赏。吴先生回忆自己应徐复先生的要求，撰写关于《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书评，蒋先生对他非常感谢。后来

有幸当面聆听蒋先生的教诲，蒋先生一句“话不要说死”的教诲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对这句看似平常的话自己今日有了很深的体会。它概括了做学问的一种境界，即学问是无止境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固有的结论是会不断得到修正的。

这次《蒋礼鸿集》出版座谈会，不仅仅是一次出版上的宣传活动，更是一次学术品格、学者风范的生动教育。学者们用一个个生动的事例，结合自己的体会，高度评价了蒋先生的为人学，缅怀他淡泊名利、严谨治学、奖掖后进，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汉语研究的道德文章和高尚情怀。学者们即席讲话，不拿讲稿，但真情实感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座的海内外学者以及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们无不为之动容。

## 海内外专家来中心参观

2001年9月24至27日，第二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杭州召开。会议期间，应与会代表的要求，出席会议的香港科技大学丁邦新教授、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研究员、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所长项楚教授等海内外专家60多人参观了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的汉语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的传统。早在五十年代中，原杭州大学中文系就组建了古汉语教研室，稍后又成立了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聚集了一大批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专家学者。著名语言学家姜亮夫、任铭善、蒋礼鸿、郭在贻等都先后在此执教。1998年，由原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四校合并组建成立的新浙江大学，把原四校从事汉语言研究的力量联合在一起，成立了汉语言研究所。1999年10月，又根据新的科研体制改革的精神，以原汉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主体，联合古籍所、计算机系、日本文化研究所等系科，优化整合，组建成立了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积累，中心现有办公资料用房面积达600平方米，每位教师均有9—18平方米配有电脑等设备的办公室；并有配备多媒体设备的学术活动中心；资料中心面积达200平方米，拥有图书资料近10万册，并有全套的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和四库全书光盘等检索系统，中

心的办公科研条件已达国内一流。

对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优越的办公科研条件，代表们参观后赞叹不已。著名学者、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认为，本中心专业图书资料之富，应为国内同类机构之冠。

## 学术交流

### 北京大学蒋绍愚教授来我中心访问、讲学

9月28日，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蒋绍愚先生来我中心访问，并为师生作了题为《“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兼谈语法化、类推和功能扩展》的学术讲座。语法化是当今语言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问题，但对语法化应该怎么认识，并如何运用这一新思路来分析、认识汉语发展中一些比较特殊的现象？蒋先生的讲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最新的研究动态，并通过缜密的分析，指出：语法化不仅仅是实词虚化，在语言事实中，功能扩展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来，A型句有X功能，B型句有Y功能。后来，由于语法的演变，A型句也逐渐取得了Y功能，它的功能由X扩展到兼表X和Y，这就是功能扩展。”蒋先生认为“类推（analogy）在语法演变中的作用也应该得到充分重视”，“类推有时和语法化一样，也可以是改变系统的推动力。”在精彩的讲座之后，蒋先生回答了中心师生们的提问。这次讲座对同学们扩展学术视野、开拓学术思维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 著名汉学家何莫邪教授来我中心访问、讲学

9月28日，著名汉学家、语言学家，挪威奥斯陆大学何莫邪教授来汉语史研究中心访问，并分别于上午和晚上作了两场学术报告。何先生的学术报告是《汉语语

义分析》和《汉语语法分析》。以作语义分析时，何先生以“哭”、“泣”二词为例，对其异同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辨析；并结合外语辨析了“形”、“躯”、“身”、“体”、“肢”、“躬”等表示身体的同义词。何先生指出，词义辨析要从逻辑分析入手，要注重系统性，批评了以往研究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何先生还指出：从事汉语研究不能只限于汉语本身，研究者应该同时懂得多种外语，在把汉语和外语作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方能看出汉语的特点，研究才能深入。何先生的报告幽默风趣，视角独特，受到了师生们的欢迎。

## 王明华参加对外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七次学术讨论会于今年7月11日至15日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共7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就现代汉语语法、对外汉语教学方法、对外汉语教学手段进行了热烈讨论。我中心王明华老师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他提交的论文是《二十年来汉语句型研究》。

## 简讯

### 校图书馆竺海康副馆长来中心检查指导工作

2001年9月29日，校图书馆常务副馆长竺海康研究员来中心检查指导工作。多年来，校图书馆对本中心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1996年，原杭州大学图书馆为支持本中心研究人员《敦煌文献合集》的编纂工作，特设敦煌文献特藏书库；1999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敦煌学资料中心，将校图书馆及各院系资料室内所藏这方面的书刊集中于此，由图书馆与本中心共建共管。同时，校图书馆还在新书采购和外文图书借阅等许多方面为本中心的研究工作提供优质服务。正是在学校图书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本中心资料中心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现已成为拥有中外文图书近十万册、有着明显特色的专业资料中心，拥有多套大部丛书或缩微胶卷，



如全套敦煌学缩微胶卷、《丛书集成初编》、《大正藏》、《中华大藏经》、《道藏》、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敦煌宝藏》，等等，古汉语和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的藏书之富，在国内同类机构中名列前茅。

竺馆长在检查中对本中心在图书资料建设方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竺馆长也指出，新的世纪，是信息化的世纪，汉语史研究中心有非常丰富的图书资料，宝贝很多，应按科学的系统进行分类编目，并建成数据库，实行信息上网，提供信息查询服务，达到资源共享，使汉语史研究中心真正成为本学科的全局资料信息基地。竺馆长表示校图书馆今后将在图书编目和信息化等方面为中心提供指导和帮助；对于适应这一要求的专职资料管理人员问题，学校应尽快予以解决。

竺馆长还和张涌泉教授商量的敦煌文献数据库的建设问题。该数据库是由本中心和校图书馆联合开发的，包括敦煌文献数据库、敦煌学论著数据库等，并就有关事项达成了一致意见。

## 研究生动态

### 博士后进站

2001年7月、9月，南京大学江学旺博士、厦门大学金滢坤博士先后进入本中心作博士后研究，合作教师为本中心副主任张涌泉教授。进站后，他们将参加本中心重大项目《敦煌文献合集·史部》的编撰工作，日前已与项目负责人张涌泉教授签订了责、权、利明确的工作合同。

# 文摘

## 二十世紀唐代音韻研究綱要

浙江大学 黃笑山教授

在漢語語音史的研究中，“中古”這一階段的研究是以唐代為中心的，有關中古音研究的重要成果，都和唐代有密切關係。本文所介紹的關於音韻的討論就限定在這個範圍內，有個別地方作點述評。全文只是粗綱，還未正式成稿，其中所提到的成果水平有些相當參差，有的可以代表二十世紀的最高水平，有的則問題較多，對此的分析評述，有待將來。由於學力有限，讀書不多，掛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專家學者指正。

### （一）概論性著作

概論性的著作在 20 世紀上半葉就出現了不少。第一部全面論述傳統音韻學的著作，是錢玄同的《文字學音篇》（北京大學出版組 1918），它也是向現代音韻學過渡的第一部講義，在繼承傳統音韻學成果接受現代語音學某些方法和觀點的基礎上，把對中古、上古語音的理解加以介紹和論述。其後張世祿出版了《中國聲韻學概要》（1929）、《中國古音學》（商務 1930）《廣韻研究》（商務 1931《國學小叢書》）、《音韻學》（商務 1933）等概論性著作，而他的《中國音韻學史》（商務印書館 1936）更系統勾勒了中國音韻學研究演進的歷史，從古代表音方法到《切韻》系韻書以至《中原音韻》韻書的編撰和研究，從宋元等韻學形成到明清古音學的發展，至今還沒有一部能夠取代它的書出現。馬宗霍《音韻學通論》（商務印書館 1930）分元音、變音、古音、廣韻、反切、四聲、字母、等韻諸篇論述音韻學的基本知識。姜亮夫《中國聲韻學》（世界書局 1933）用語音學原理講述音韻學原理，討論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並講述先秦古音，述及有關反切的知識，對有清以來的成果作了詳細介紹。劉躋《聲韻學表解》（商務印書館 1934）介紹音韻學基本知識，討論《廣韻》聲類、韻類和反切上下字，論述古音的材料和系統，介紹古聲十九紐和古韻二十八部，並以之製表譜入《說文》初文。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北京大學 1935）依次講述古音系的分歧、內容、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條件和實際問題。陸宗達也寫有《音韻學概論》（《中國大學校刊》1935）。林尹《中國聲韻學通論》（1937）也是這類概論性的著作。王力《中國音韻學》（商務印書館 1936，1955 中華書局再版改名《漢語音韻學》）是影響最大的音韻學通論著作之一。他的《漢語史稿》（科學

出版社 1957)、《漢語音韻》(中華書局 1980)、《音韻學初步》(商務印書館 1980)、《漢語語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等概論性和總結性的著作,在音韻學教學和研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北京大學 1949, 1956 新版)用文言文講述音韻學中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古今音變大略,重在音理和術語的講解,在幫助初學者掌握審音、明變、旁征等科學方法方面是影響巨大的。

50 年代以後,這方面得著作不斷出現。在等韻學史方面,趙蔭棠《等韻源流》(商務印書館 1957)較為清晰地揭示了等韻學史上從醞釀期(六朝至唐)到形成期(宋)以至改革期(元明清)三個階段的發展脈絡,並重點評述了元明清約四十種等韻著作。在簡明音韻學教材方面,丁聲樹、李榮《漢語音韻講義》(《方言》1981. 4, 上海教育 1984)作為教育部和中國社科院語言所 1956-1957 年“普通話語音研究班”講義,在正式出版前的 25 年中有大量油印本流傳,一些高校作為參考教材使用。它由《廣韻聲母表》、《廣韻韻母表》、《古今聲母比較表》、《古今韻母比較表》和言簡意賅的文字說明構成,分成九章,各章配有習題,最後有總復習大綱。唐作藩《漢語音韻學常識》(上海新知識出版社 1958, 上海教育 1959)介紹古音學、今音學、等韻學的基本概念和常識,音韻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普通話音系的來源。後來他又有《音韻學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 年)、《普通話語音史話》(《文字改革》1985 年第 4-6;《語文建設》1986 年第 1-3 期, 1987 年第 1-6 期)等。80 年代前後,語音史方面的有:邵榮芬《漢語語音史講話》(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方孝岳《漢語語音史概要》(香港商務印書館 1980),黃典誠《漢語語音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等。以音韻學或聲韻學為名的概論有朱星《古代漢語音韻學入門》(河北大學學報)1982 年第 3、4 期, 1983 年第 1 期)、李新魁《漢語音韻學》(北京出版社 1982)、楊潛齋《聲韻學簡析》(《華中師院學報》1984 年第 1、2 期)、殷煥先、董紹克《實用音韻學》(齊魯書社 1990)、竺家寧《聲韻學》(五南圖書公司 1991)等,其他方面還有,殷煥先的《反切釋要》(山東人民 1979)、李新魁《漢語等韻學》(中華書局 1983)、何大安《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大安出版社 1987)、方孝岳、羅偉豪《廣韻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 1988)、黃典誠《切韻綜合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4)等等。

## (二) 工具書

略。

## (三) 《切韻》系韻書研究

《切韻》系韻書包括《切韻》、《廣韻》及其各種修訂本。《切韻》和《廣韻》不

是唐代成書的，但是現在能够看到的《切韻》系韻書最早版本是唐五代流行的寫本和刻本，有的注釋還引用唐代文獻，有的文字也采用唐代俗體，《切韻》系韻書反切音讀向來作為中古語音的材料受到重視。

《切韻》系韻書的研究包括對《切韻》各種版本的輯錄整理、版本研究和音系研究幾個主要方面。

## 1. 輯錄整理

《切韻》殘卷和字母殘卷的輯錄、整理是上個世紀的重大收穫之一。自1908年國內發現蔣斧本《唐韻》殘卷繼又發現故宮項跋本《刊謬補缺切韻》（王二）以後，尤其是中國學者把英法等國探險家、考古學家弄走的敦煌韻書殘卷從巴黎倫敦等地抄錄或拍片帶回以後，《切韻》的校勘補逸和版本體例研究就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1921年，王國維通過羅振玉輾轉從伯希和處得到倫敦博物院所藏的三種《切韻》殘卷（切一、切二、切三）照片，親自影抄，加以考跋付印行世。1925年，劉復把從巴黎抄回的《刊謬補缺切韻》（王一）和兩種《切韻》序文刻入《敦煌掇瑣》。1936年，劉復、魏建功、羅常培把當時能看到的唐寫本《切韻》殘卷五種、《刊謬補缺切韻》殘本兩種、《唐韻》殘本一種、五代本《切韻》殘卷一種彙輯在一起，和《廣韻》排比對照，編成《十韻彙編》。1947年故宮博物院將新發現的完本《刊謬補缺切韻》（宋跋本，王三）影印出版，唐蘭作跋。50年代後，姜亮夫把自己摹錄巴黎、柏林、倫敦所藏敦煌韻書殘卷33種，輯為《瀛涯敦煌韻輯》（上海出版公司1955）。1972年，潘重規把姜書與藏于巴黎、倫敦的原卷通校一過，摹抄姜書33種卷子，校正了前人抄錄的錯誤，并增補新抄的敦煌韻書卷子12種，輯為《瀛涯敦煌韻輯新編》（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並作《瀛涯敦煌韻輯別錄》（香港新亞研究所1973）以為補編。1983年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中華書局）匯集國內外所存的30種唐五代寫本刻本韻書和9種韻字摘抄及有關字母等韻的寫本，考辨比證唐五代各種韻書異同，根據體例、性質和內容編為傳寫本《切韻》、箋注本《切韻》、增訓加注本《切韻》、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和五代本《切韻》七類，各種韻書采用原件影印，照片不清則附摹本或摹刻本，并寫出校記，考釋其體制內容及特點，是作者對唐五代韻書整理考訂的總結性著作，也代表了《切韻》系韻書的最高整理水平。1990年姜亮夫將《瀛涯敦煌韻輯》字部原卷和論部修訂改編，為《瀛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浙江古籍出版社），其中蔡勇飛校正字之訛誤佚遺及文之未安者數百言。1994年，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在臺灣重版，增加了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所藏的《箋注本切韻》、《唐韻》殘葉三件。這些韻書的輯錄出版為音韻學研究帶來極大的方便。例如，龍宇純就利用各種韻書及諸家校勘記為校勘材料，對《王三》進行校訂箋識，撰為《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香港中文大學1968）；葉鍵得也寫出以《十韻彙編研究》為題的博士論文（1988）。這方面的輯錄還有日本上田正《切韻逸文的研究》（汲古書院1984），此書從中日各種典籍裏輯錄出所引《切韻》系韻書及唐代相關韻書的音注，亦有參考價值。

## 2. 考鏡源流

王國維是最早考論《切韻》系韻書源流的學者。其考論《書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唐寫本切韻後》和《六朝人韻書分部說》《書內府本所藏王仁昫切韻後》《書式古堂書畫匯考所錄唐韻後》《書吳縣蔣氏藏唐寫本唐韻後》《書小徐本說文解字篆韻譜後》《書古文四聲韻後》《唐諸家切韻考》《李舟切韻考》《唐廣韻宋雍熙廣韻》《天寶韻英陳廷堅張戢考聲切韻武玄之韻詮分部考》等文，皆收於《觀堂集林》卷八之中，內容涉及韻書的形成、《切韻》和呂靜等五家早期韻書的關係、《唐韻》李舟《切韻》等唐代韻書和《切韻》《廣韻》的關係等。

其後許多學者都在這方面作出努力，例如劉盼遂《跋唐人寫韻書二殘箋》（《實學》1926年第6期）《六朝唐代反語考》（《清華學報》1934年第9卷第1期）、丁山《唐寫本切韻殘卷跋》（1928）、董作賓《跋唐寫本切韻殘卷跋》（1928）、方國瑜《敦煌唐寫本切韻殘卷跋》（1931）、陸志偉《唐五代韻書跋》（《燕京學報》第26期，1939）、徐仁甫《李舟切韻志疑》（《志學月刊》1942年第10期）、《跋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五代刊本切韻殘卷後》（《志學月刊》1942年第11期）等。而在上世紀前半葉中，魏建功是繼王國維之後在韻書系統方面做出貢獻的大家，他的《唐宋兩系韻書體制之演變：敦煌石室存殘五代刻本韻書跋》（《國學季刊》第3卷第1期，1932）、《陸法言〈切韻〉以前的幾種韻書》（《國學季刊》第3卷第2期，1932）、《論〈切韻〉系的韻書：〈十韻彙編〉序》（《國學季刊》第5卷第3期，1935）、《故宮完整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漢學雜誌》1948）及《故宮完整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續論之甲》（《國學季刊》第7卷第2期，1951）、《〈切韻〉韻目次第考源》（《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4期）《〈切韻〉韻目四聲不一貫的解釋》（《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2期）等文章對於韻書的版本、體制、源流等作了細緻的考證。另外姜亮夫在輯錄《切韻》系韻書的過程中，也對原作品質款式、字體注釋、聲韻類別等內容作了大量考論研究，他的《大英博物館藏敦煌寫本卷子S512歸30字母例跋》（《經世季刊》1941年第2卷第1期）、《P2017為陸法言原書韻目跋》（《志學月刊》1942年第2期）、《大英博物院藏敦煌唐寫本陸法言切韻考》（《志學月刊》1942年第3、10期）《大英博物館藏唐寫本切韻研究之一：S2017為隋末唐初增字家注本陸韻證》（《雲南大學學報》1942年1類第2號）等文和他的《敦煌瀛涯韻輯》一樣受到重視。

在這方面的重要研究還有，羅常培《切韻序校釋》和《切韻探蹟》（皆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3集第25、26、27期合刊，1928）、趙蔭堂《唐武玄之韻銓鱗爪》（《晨報》北平，1935年4月19、20）、趙振鐸《讀〈瀛涯敦煌韻輯〉》（《中國語文》1962年第2期）、胡竹安《唐寫全本〈刊謬補缺切韻〉所存〈切韻序〉疏義》（《江西師院學報》1982年第4期）、王顯《〈切韻〉綱紀討論制定的年份》（《古漢語研究論文集》[二]北京出版社1984）、《有關〈切韻〉二三事》（《古漢語研究論文集》[三]北京出版社1987）、《也談增字本〈切韻〉殘卷第三種》（《古漢語研究》93.1）、小川環樹《論〈說文篆韻譜〉部次問題：〈李舟〈切韻〉考〉質疑》（《語言研究》1983年第1期）、林炯陽《敦煌韻書殘卷在聲韻學研究上的價值》（《漢學研

究》4卷2期1986)、向功曼《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故宮所藏龍鱗裝孤本》(《歷史知識》1986年第1期)、平山久雄《〈切韻〉和陸爽》(《中國語文》90.1)、周祖謨《論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羅常培紀念文集》商務印書館1984)、李國華《讀〈切韻〉殘卷》(《雲南民族學院學報》90.4)、紀國泰《〈鉅宋廣韻〉考證》(《成都師專學報》91.1)、薊鄆《〈廣韻〉校勘拾零》(《社會科學戰綫》91.2)、呂朋林《〈切韻〉議綱年份考辨》(《語言研究》96增刊)、劉冬冰《試論〈切韻〉系韻書的形成和演進》(《河南教育學院學報》97.4)、聶鴻音《俄藏宋刻本〈廣韻〉殘卷述略》(《中國語文》98.2)、黃典誠《中國現存第一部韻書〈切韻〉(故宮本)》(《漳州師專學報》1984年第1期)、王顯《有關〈切韻〉二三事》(《古漢語研究論文集》三,北京出版社1987)、《也談增字本〈切韻〉殘卷第三種》(《古漢語研究》93.1)等,另外,古德夫《宋跋本王韻與切韻》(《徐州師院學報》1982年第1期)、《評余迺永〈互注校正宋本廣韻〉》(《語言研究》1983年第2期)、《〈廣韻〉〈王韻〉〈切韻〉大韻異同考》(《徐州師院學報》1983年第4期)、《〈唐韻〉對〈切韻〉語音的改易》(《徐州師院學報》90.2)、《〈廣韻〉反切的來源:〈切韻〉到〈廣韻〉的反切改易》(《中國語言學報》91.4)等文章在韻書的許多問題上發表了重要的見解。

《廣韻》是根據唐本《切韻》纂錄而成的,所以對《廣韻》的校正也是利用唐五代各種相關韻書和《廣韻》的各種版本及其他文獻材料參證進行的。張世祿《廣韻研究》(商務印書館1931)對《廣韻》反切的注音方法、韻部、聲類等以及《廣韻》的源和流作了系統考證和講述。周祖謨《廣韻校本》(商務印書館1937)利用唐人20多種韻書殘卷考核訂正,是上個世紀最有價值的《廣韻》校本之一。余迺永《互注校正宋本廣韻》(聯貫出版社1975初版)以周祖謨依澤存堂刊本所校的《廣韻校本》為底本,再作校注,重在增補互注又音,在天頭加校文、地脚加又音,每小韻加擬音,隨文用符號套紅刊出;下冊是校勘記,詳細討論上冊校文中的問題。余迺永此書出版以後多次再版,1992年更名《新校互註宋本廣韻》,2000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又出增訂本,後出轉精,受到學界的好評。葛信益《廣韻叢考》(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結集了他1937-1990年的十六篇《廣韻》校勘的論文,這些論文根據《廣韻》的體例,利用各種《切韻》《唐韻》殘卷分別對其正文、注釋、又音、異讀等詳加校訂,一些結論常常被人稱引。古德夫《漢語中古音新探》(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是專門研究唐寫本《切韻》和《廣韻》異同考的專著,由九篇論文和“《切韻》殘卷和宋跋本王韻反切表”組成,其中八篇文章是論音的,通過對《王三》、各種《切韻》殘卷、《唐韻》和《廣韻》的韻目、韻次、大韻、小韻、反切等異同的詳細比較,指出《切韻》是綜合音系,其反切是依照六朝舊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反復指出《切韻》和《廣韻》所反映的語音實際不是完全相等的,《廣韻》的反切經過審音和變更,吸收了其他韻書的韻字反切,其韻字的系聯反映出聲類韻類都產生了差異,已不同于《切韻》。另外,趙少咸從1919年始利用各種典籍、音義書和相關韻書,對《廣韻》的字數、引書、注釋、音切等作了深入研究,1933年寫成《新校〈廣韻〉》,1956年寫成《〈廣韻〉疏證》,惜其稿大半散失在1960-70年代的動蕩

之中，所發表者僅見《廣韻疏證·序例》《廣韻諧聲表·序》（《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3期）、《〈切韻序〉註釋》（《語言文字研究專輯》[上]）等文。

### 3.《切韻》性質

音韻學的研究向來以中古音為樞紐，中古音的研究一般又以《切韻》系韻書為重點，因此《切韻》音系的性質問題顯得尤為重要。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不盡形成了不同的論派，而且在現代音韻學研究中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模式。

早期的看法有章太炎的兼有古今方國之音說，黃侃的包舉周漢至陳隋之音說，[瑞]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法]馬伯樂《唐代長安方音》（1920）、[蘇]龍果夫《對於中國古音重訂的貢獻》（1928）的長安音說，羅常培《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高本漢切韻音讀商榷之一》（《史語所集刊》第2本第3分，1931）的最小公倍數說，陳寅恪《從史實論切韻》（《嶺南學報》1949年第9卷第2期）的洛下舊音說等。

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關於《切韻》性質的問題的討論更加熱烈，李榮《陸法言的〈切韻〉》（1957）認為《切韻》不是一個兼包古今的韻書，它如實地記錄了一個內部一致的語音系統，後來他還發表《論李涪對〈切韻〉的批評和相關問題》（《中國語文》1985年第1期）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邵榮芬《〈切韻〉音系的性質和它在漢語語音史中的地位》（《中國語文》1961年第4期）主張《切韻》音系大體是活方言，它以洛陽音為基礎，以金陵音為參考，可以做中古音的代表。王顯《〈切韻〉的命名和〈切韻〉的性質》（《中國語文》1961年第4期）、《再談〈切韻〉音系的性質》（《中國語文》1962年第12期）和邵榮芬的意見相似。

黃涪伯發表了《論〈切韻〉音系並批判高本漢的論點》（《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切韻〉“內部證據”論的影響》（《南京大學學報》1959年第2期）、《關於〈切韻〉音系基礎的問題：與王顯、邵榮芬兩位同志討論》（《中國語文》1962年第2期）、《〈切韻〉音系的本質特徵》（《南京大學學報》1964年第3、4期）認為《切韻》是集成魏至隋以來諸家舊韻兼包當時方音的韻匯。何九盈也發表了《〈切韻〉音系的性質及其它：與王顯、邵榮芬兩位同志商榷》（《中國語文》1961年第9期）不同意切韻為單一音系的觀點。史存直《從唐七家詩的用韻情況看〈切韻〉的性質》（《漢語音韻學論文集》華東師大出版社1997）用詩韻的106韻來歸納孟浩然、王維、李白、杜甫、韋應物、白居易、柳宗元的詩歌押韻，認為即使是106韻也是綜合性質的，《切韻》所代表的語音體系就更是一個綜合體系。趙振鐸《從〈切韻序〉論〈切韻〉》（《中國語文》1962年第10期）、羅偉豪《從〈顏氏家訓·音辭篇〉論〈切韻〉》（《中山大學學報》1963年第1、2期合刊）也對此發表了意見。後來周祖謨《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語言學論叢》第五輯，商務印書館1963）公元六世紀南北士人同用的雅音，主要根據南方承用的書音。此說影響較大。

80年代以後，《切韻》性質問題的討論熱度不減，這方面文章如黃典誠《〈切韻〉性質的探討》（《廈門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張琨《〈切韻〉的綜合性質》（《書目季刊》18卷1期，1983）都產生了一定影響。其他文章還有，李毅夫《〈切韻〉

韻部特多的原因》(《齊魯學刊》1984年第1期)、萬獻初《〈切韻〉——金陵洛下讀書音》(《咸寧師專學報》86.3)、潘文國《論總合體系:〈切韻〉性質的再探討》(《華東師大學報》86.4)、胡和平《也談〈切韻〉音系的性質》(《鄭州大學學報》87.2)、李新龍《對〈切韻〉音系性質諸說之評價》(《喀什師院學報》88.4)、姜書利《〈切韻〉性質諸說述評》(《呼蘭師專學報》88.3)、李行杰《〈切韻〉性質再議》(《語海新探》山東教育出版社89)、張玉來、徐明軒《論〈切韻〉語音性質的幾個問題》(《徐州師範學院學報》91.3)、張民權《試論〈切韻〉一書的性質》(《南昌大學學報》93.4)、[日]古屋昭弘《韻書中所見吳音的性質》(《吳語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95)、蔡寶瑞《論〈切韻〉的性質》(《語文應用與研究》96.4)等等,都對《切韻》的性質問題發表了意見。80年代末王均翻譯了張琨《〈切韻〉的綜合性質》(《語言文字學術論文集:慶祝王力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知識出版社1989),1990年華中工學院出版社出版了張賢豹翻譯的張琨《漢語音韻史論文集》之後,學界對《切韻》性質的主流意見基本上趨向認為《切韻》反映的不是單純的某地方音的系統了。

對《切韻》性質的不同看法,導致了音韻研究的不同模式。王力晚年認為《切韻》不代表一時一地的語音,因此他的《漢語語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研究根本撇開了《切韻》系韻書,利用《顏氏家訓·音辭篇》和南北朝的詩歌用韻來構擬魏晉南北朝音系,利用《經典釋文》(583)和玄應的反切(627-650)來構擬隋唐音系,利用南唐朱翱的反切構擬晚唐-五代音系。王力的做法給學界帶來了一些良好的影響,那就是充分利用《切韻》系韻書以外的音韻材料來作中古音構擬的依據,而且“中古”也被分成明確的階段。不過,這種做法似乎把語音史看成是一種理想的標準音系的直綫發展,忽略了語音演變中方言的因素,方言基礎的變更以及由此引起的語音變化等等,所以他沒有考慮他所選用的擬音材料是有方言的差別的。比如《經典釋文》的作者陸德明的反切可能反映了南方的讀音,《經典釋文》中的其他20家音注可能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方言的音讀,玄應《一切經音義》則可能反映了北方的讀音,它們可能是不完全相同的系統。又如居思信《“中古韻部系統”構擬》(《齊魯學刊》93.3)也撇開《切韻》,利用唐代初、盛、中、晚4個時期60位詩人7000多首古體詩12000個韻段,編出《唐詩韻譜》、《唐詩韻部歸字表》在此基礎上構擬出舒聲22部入聲9部的中古音系統。他整理韻部的成績是非常有意義的,對瞭解唐代語音的實際有重要作用。不過,初唐和中晚唐是處在一次語音變化的大動蕩的兩端,有必要做出分階段的研究和構擬。另外,他為這22個韻系構擬了一個有四個高度層級的11個元音的系統,也許有必要作音位的歸併。

張琨上述書中的四篇代表性論文主張方言差異自古而然,雖然承認《切韻》是反映實際語音的差別的,但認為《切韻》反映的是成書以前的幾百年不同地域的方言,具有綜合性質,其中南方成分多於北方方言。所以他也不用《切韻》來代表中古音系。他反對把漢語史拉成一條直綫,主張注意音韻歷史上的方言性,提出另外一種時空結合的研究模式,既重視文獻材料,又重視方言材料,利用現代方言特點去簡化《切韻》系統,又用《切韻》去投射原始漢語系統,以求建立原始方言。不



過，這種模式沒有明顯的歷史階段性，在斷代的研究方面有所不足。

黃典誠《切韻性質的探討》（《廈門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認為《切韻》是一個能够代表中古音系的斷代研究材料，它的體系中疊合了南北兩大代表方言的同源成分，其中一為合乎傳統的雅音，一為口語音，在當時都可以“驗諸唇吻”，是一個文白交相為用的單一系統，因此他的著作很重視反切又音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的研究。丁邦新《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國語文》1995年第6期）仍然把《切韻》看成是中古的代表音系，但他主張《切韻》是南北兩大方言相加而來的綜合的音系，據此他提出利用《切韻》來分別構擬金陵洛下兩個音系，主張對《切韻》作南北兩個音系的還原，同時對現代方言材料、中古的對音和域外方言材料作地域和源流的區分。這種構想的研究也還有待深入。和丁的主張有某點近似的，黃笑山《〈切韻〉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統》（臺灣文津出版社1995）也主張把擬音材料也作了時代和地域的區分，但他傾向於認為《切韻》是在一個單一系統中疊合了不同的方言層次的因素，中唐時代的語音和《切韻》音系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標準音的方言基礎的轉移造成的。所以他對方言材料、對音材料、域外方言和現代方言所作的區分，是為了對中古的兩個階段（《切韻》時代和中唐-五代）分別做出語音系統的構擬，並嘗試著闡述了其間的發展。

#### 4. 反切問題

反切問題研究包括研究反切的構造規律、反切系統所反映的音類音位等語音問題、反切又音問題等等，有些問題將在其他地方討論，反切又音問題見下節，其他暫時從略。

#### 5. 又音問題

研究韻書又音可以增進對韻書的源流、字音的發展、方音的差異等方面的了解。

黃侃很早就對《廣韻》又音作出研究，有《廣韻所載又音》《字有又音而不見本韻及他韻者》等文（《廣韻校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此後在又音問題上用力最勤的主要有葛信益、黃典誠、余迺永等人。葛信益《〈廣韻〉訛奪舉正》（《音韻學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84）、《張氏澤存堂本〈廣韻〉異讀字形訛舉例》（《中國語文》1984年第4期）、《〈廣韻〉異讀字有兩體皆聲者》（《中國語文》1985年第1期）、《〈廣韻〉異讀字釋例》（《語言研究》1985年第2期）等文（後來匯集在他的《廣韻叢考》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討論又音及其體例，指出方俗古今、音隨意變等都可能成為又音產生的原因。黃典誠《反切異文在音韻發展中的作用》（《語言教學與研究》1981年第1期）、《〈切韻〉的異讀：反切異文類聚》（《切韻綜合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認為又音字是漢語語音發展中積澱的產物，可以作為研究上古至中古語音發展的材料。余迺永的又音研究主要體現在他的《新校互注宋本廣韻》之中。趙振鐸《〈廣韻〉的又讀字》（《中國音韻學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84）也是討論又音字古今或方音差異以及構詞等問題的。這方面的文章還有趙銳《〈廣韻〉又讀字的研究》（《哈爾濱師範大學學報》1961年第1期）、汪壽明《從〈廣韻〉的同義又讀字談〈廣韻〉音系》（《上海師大學報》1980年第3期）、羅偉豪《關於〈切

韻)“又音”的類隔》(《學術研究》1983年第4期)、李長仁、方勤《試談〈廣韻〉“又讀”對漢語語音史研究的價值》(《松遼學刊》1984年第2期)、林濤《〈廣韻〉少數字今讀與其反切規律音有別的原因》(《廣西大學學報》89.1)、劉曉南《〈廣韻〉又音考誤》(《古漢語研究》96.1)和《從〈廣韻〉又音看古代的語流音變》(《語言研究》96增刊),李葆嘉《〈廣韻〉真諄部反切下字類隔芻論》(《古漢語研究》96.1)、《〈廣韻〉大韻韻目與小韻韻目之字同切異考》(《語言研究》96增刊),李長仁《談〈廣韻〉“又讀”中的假借》(《松遼學刊》96.1)等。

## 6. 音系構擬

《切韻》音系的構擬開始于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而且自高本漢開始,《切韻》音系的構擬就和中古音的構擬相聯係,所以我們把這方面的內容放在“中古音系研究”裏說。

# (四) 音義書研究

## 1. 《經典釋文》

### 1.1 《經典釋文》整體研究和陸德明音

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經籍舊音序錄》《經籍舊音辯證》中對《經典釋文》中的作音人及其音注作了考證和闡釋,黃侃《經籍舊音辯證箋識》對吳著作了校訂和釋疑,沈兼士《吳著經典舊音辯證發墨》運用吳著裏的材料闡說“語根字族”。

早年羅常培曾打算整理《經典釋文》語音系統,寫有《〈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兩紐》(《史語所集刊》第8本第1分,1937)、《段玉裁校本經典釋文跋》(《圖書季刊》新1卷第2期,1939)、《唐寫本經典釋文殘卷四種跋》(《清華學報》第13卷第2期,1941)、《法偉堂校本經典釋文跋》(《圖書月刊》第2卷第4期,1942)、《唐寫本〈經典釋文〉殘卷五種跋》(《國學季刊》第7卷第2期)等,終因事務繁雜,未能作反切音系研究。陸志偉、林燾有《〈經典釋文〉異文值分析》(《燕京學報》第38期,1950)、陸志偉《〈經典釋文異文之分析〉補正》(《燕京學報》第40期,1951)、林燾《陸德明的〈經典釋文〉》(《中國語文》1962年第3期)

邵榮芬《略說《經典釋文》音切中的標準音》(《古漢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出版社1982)、《〈經典釋文〉的重音音切》(《中國語文》89.6)、《陸德明反切用字析略》(《語言研究》91增刊)和《〈經典釋文反切研究〉內容釋要》(《漢字文化》90.2)等。邵榮芬《經典釋文音系》(臺灣學海出版社1995)是最新的一部專著,該書把《經典釋文》中的陸德明音切作了全面整理,考證出陸氏的聲韻調系統,做出了《同音反切字表》,並對其音值作了構擬,肯定陸氏的反切音系是當時與《切韻》為代表的北方標準音系并立的南方標準音系。另外,黃坤堯寫有《〈經典釋文〉內校舉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7卷86)、《〈釋文〉如字初探》(《高雄師院》88)等文,蔣希文也有《〈經典釋文〉音切的性質》(《中國語文》89.3)等文章。

## 1.2 《經典釋文》諸家音注研究

略。

## 2. 玄應《一切經音義》

唐釋玄應所作的佛經音義中有大量的反切，整理這些反切的音系周法高和王力做的工作最多。周法高《玄應反切考》（《史語所集刊》第20本上冊，1948）認為玄應的系統十之八九和《切韻》音系相同，大致是當時的長安音系。王力《玄應一切經音義反切考》（《武漢師範學院學報》1980第3期）有些結論和周法高不同，周法高《玄應反切再考》（《大陸雜誌》69卷5期1984）對王力的說法作了評說，並以玄應音為依據構擬了唐代長安音系統。

## 3. 慧琳《一切經音義》

唐釋慧琳音義中的反切是一份重要的語音材料，黃淬伯《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考韻表》（《國學論叢》第2卷第2期，1930）、《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聲類考》（《史語所集刊》第1本第2分）和《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考》（史語所1931年專刊之八）認為慧琳反切據唐天寶元廷堅《韻英》音所作，考得36聲類、173韻類，跟《切韻》音系有不小的出入，是利用傳統的反切系聯法取得的一個明顯的收穫。1970年他在舊作基礎上寫成《唐代關中方言音系》（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他為這個音系作了構擬，重在突出音系結構，沒有採用舊作的全部反切，另外，為了說明語音的發展，他又和《切韻》《韻鏡》《切韻指掌圖》作了比較。在這方面，[日]水谷真誠《慧琳音義雜考》（《支那學報》創刊號，1956）、《慧琳的言語譜系：北天竺轉寫漢字的對音》（《佛教文化研究》第5號，1955）等文對慧琳的音譯和反切情況作了討論。徐時儀《慧琳一切經音義注音依據考》（《徽州師專學報》1989年第3期）、《慧琳音義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從文獻學角度對其成書、源流、體例、特色等作了研究。姚永明《慧琳音義語言研究》（浙江大學1999年博士論文）也從音韻、文字、訓詁、辭書編撰和古籍整理角度對其進行了研究。而謝美齡《慧琳反切中的重組問題》（《大陸雜誌》81卷1、2期，1990）討論慧琳反切中的重組問題。有關資料方面，陸宗達作了《慧琳一切經音義索引》（商務印書館1938），而[日]上田正《慧琳反切總覽》（汲古書院1987）更為研究慧琳音提供了方便。

## 4. 慧苑《一切經音義》

[日]水谷真誠《慧苑音義反切考：資料的分析》（《大谷大學研究年報》第11集，1959），其他暫待補。

## 5. 張參《五經文字》的研究

唐代張參《五經文字》是那些距離《切韻》時代較近的音系之一，它提供了《切韻》以後音變過程中相對較早的一些極其實貴的特徵。邵榮芬《〈五經文字〉的直音和反切》（《中國語文》1963.3）通過《五經文字》所載音切和以《廣韻》為代表的《切韻》系統切音比較的方法，指出《文字》音系輕重唇徹底分化之後，非、敷兩母的確經過了一個對立階段；仙韻的重組先向先、元分流，通過先、元的合併才最終混一；皆、佳、夬、麻合併；清、青不分等等重要的語音發展綫索。

## 空海《篆隸萬象名義》的研究

周祖謨《論篆隸萬象名義》(《國學季刊》5卷4期,《問學集》下冊,中華1966)認為《名義》的反切系統比較完整地保留了原本《玉篇》的系統,其韻母和《切韻》相近,只有哈灰、脂之、真臻殷、尤幽、嚴凡、庚三清相混。聲母方面幫滂並已經分出非敷奉,明微仍未分出;端透定已經分出了知徹澄,泥娘仍未分出,且與日母也部分相混;從邪、禪船、崇俟不分。邵榮芬《切韻研究》對《名義》作了抽查,發現刪山、蕭宵也相混;而且泥娘應該是分立的。周祖庠《純四等韻與三等韻德合一:〈篆隸萬象名義〉音論之一》(《中國音韻學會第十一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有限公司2000)指出《名義》三四等韻混切的現象,並認為三四等韻不僅介音相同,而且元音也一致。鄭林嘯《〈篆隸萬象名義〉唇音、舌音及半齒音研究》(《中國音韻學會第十一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有限公司2000)用概率統計法,指出《名義》輕唇音並未分化,泥娘日仍合為一,且同一組聲母不一定同步分化。

### 《文選》唐代音注研究

唐代《文選》音的研究在上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取得的成就較大一些。早年周祖謨《論文選音殘卷之作者及其方音》(《問學集》上,中華書局1966)對敦煌殘卷P.2833作了一些考證。後來徐之明寫有《〈文選〉聯綿字李善易讀音切考辨》(《貴州大學學報》91.1)、《〈文選〉李善音切校議》(《貴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文選音決〉反切聲類考》(《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二輯,巴蜀書社2000),張潔寫有《〈文選〉李善注音切校議》(《古漢語研究》95.1)、《〈文選〉李善注的直音和反切》(《語言研究》1998增刊)、《〈音決〉聲母考》(《古漢語研究》1999年第4期)、《李善音系與公孫羅音系聲母的比較》(《中國語文》1999年第6期)都對李善音和公孫羅《音決》作了音系研究,李長庚《〈文選〉舊音的音系性質問題》(《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一輯(下)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巴蜀書社98)也對《文選》舊音發表了看法。

### 《史記》唐代音注研究

《史記》的音注研究有黃坤堯的《史記三家注異常聲紐之考察》(《師大國文學報》16卷1987)、《史記三家注異常韻母及聲調之考察》(《東方文化》1993年第2期)、《〈史記〉三家注之開合現象》(《中國語文》94.2)《〈史記〉三家注的重紐現象》(《中國語言學報》商務印書館1999)等,游尚功《司馬貞〈史記索隱〉聲類》(《貴州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史記正義〉反切考》(《貴州師大學報》1994年第1期)、張守節《史記正義》中的重紐》(《黔南民族師專學報》95.1)等,龍昇騰《〈史記正義〉反切考》(《貴州師大學報》94.1)等對《史記》讀音狀況作了探討。

### 《漢書》唐代音注研究

由於顏師古是《切韻》主編顏之推的後人,所以對顏師古《漢書》音注的研究顯得格外引人注目。鍾兆華寫了《顏師古反切考略》(《古漢語研究論文集》北京出版社1982)以後,董忠司也完成《七世紀中葉漢語之讀書音與方俗音:初唐顏師古

音系及其他》(新竹師專學報)1986年13期),並著《董鍾兩家顏師古音系的比較》(《第十屆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2)來討論他和鍾兆華的不同結論。謝紀鋒的《從〈漢書〉顏氏音切校勘看音韻學再古籍整理中的作用》(《語言研究》1987.1)、《〈漢書〉顏氏反切聲類系統研究》(《學術之聲》第3輯,1990)、《〈漢書〉顏氏直音釋例》(《北京師大學報》1991.6)、《〈漢書〉顏氏音切韻母系統的特點》(《語言研究》年第2期)、《〈漢書〉音切校議》(《內蒙古民族學院》1992.2)、《〈漢書〉顏氏音切校議(續)》(《薪火編》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6)討論較為深入。另外張文軒《顏師古的“合韻”和他的古音學》(《蘭州大學學報》1987.4)、歐陽宗書的《〈漢書·音注〉聲母系統》(《江西大學學報》1990.4)和《〈漢書·音注〉的韻母系統及其語音基礎》(《江西大學研究生學刊》1990.2)、馬重奇的《顏師古〈漢書注〉中的“合韻音”淺論》(《福建師大學報》1989.1)和《顏師古〈漢書注〉反切考》(《福建師大學報》1990.3)、任福祿的《顏氏古〈漢書注〉舌音唇音反切聲類研究:兼與馬重奇先生商榷》(《古漢語研究》1993.3)和《顏氏古〈漢書注〉中的齒音喉音反切聲類》(《青海師大學報》1993.1)等文,也都就顏師古音注中的各種問題展開了討論。

### 《晉書》唐代音義研究

邵榮芬《〈晉書音義〉反切的語音系統》(《語言研究》1981年第1期)首先全面地對《晉書音義》所反映的語音作了研究,其後一些研究對《晉書音義》中的各種語音演變展開了討論,例如李無未的《〈晉書音義〉的“協韻音”》(《吉林大學社會科學》1993.1)、任福祿和荊貴生的《簡論〈晉書音義〉中的舌音分化》(《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一屆學術討論會、漢語音韻學第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等。

### 《後漢書》唐代李賢音研究

對李賢音的研究有黃錦君《後漢書李賢注反切考》(《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研究生論文選刊》1986)、孫玉文《李賢〈後漢書音注〉的音系研究(上)》(《湖北大學學報》93.5)等,一般認為李賢的音系大致代表唐代標準音。

### 《說文》唐五代音注研究

五代徐鉉、徐鉉整理《說文》,並稱大小徐,大徐本採用《切韻》一系反切,小徐本則由朱翱作反切,嚴學宥先後寫了《大徐本說文反切的音系》(《國學季刊》第6卷第1期)和《小徐本說文反切之音系》(《國立中山大學師範學院季刊》)第1卷第2期)採用繫聯法考知二者反映了不同的音系。張世祿也作了《朱翱反切聲類考》(《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集刊》1943第1期)、《朱翱反切考》(《說文月刊》1944第4卷)專門對朱翱音系作了研究。王力也寫了《朱翱反切考》(《龍蟲并雕齋文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82)得出的結論和嚴、張不盡一致。張慧美《評張世祿、王力兩家對朱翱反切聲類畫分之得失》(《建國學報》8卷89)、《朱翱反切新考之導論與結語》(《建國學報》9卷90.7)《朱翱反切中的重組問題》(《大陸雜誌》69卷4期,88)注意到前賢的分歧,並對音系中反映出來的重要問題作了討論。這方面德

文章還有范進軍《大徐本切音致誤的原因初探》（《湘潭師院學報》88.2）、張渭毅《朱翱反切的開合系統》（《語言研究》1994年增刊）等。周祖謨《唐本說文與說文舊音》（《史語所集刊》第20本上冊，1948）對唐代以前給《說文》注音的情況作了考證。

### 其他語音史料的研究

對於散見在各種文獻中的語音史料的發掘和整理，敦煌文獻的利用取得了不少成果。

在利用敦煌文獻整理音系方面，邵榮芬《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國語文》1963年第4期）為研究這個時期的語音發掘了新的材料，他分析了敦煌文獻中別字異文，從中歸納出唐五代西北方音的許多特點。[日]平山久雄《敦煌〈毛詩音〉殘卷反切的結構特點》（《古漢語研究》90.3）則通過對敦煌《毛詩音》反切的分析，得出反切拼合“類相關”的結論。周祖謨《關於唐代方言中的四聲讀法的一些資料》（《語言學論文集》第二輯）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8）、《唐五代的北方語音》、《敦煌變文與唐代語音》等文章，討論了唐代文獻和語音史的關係。孫其芳《敦煌詞中的方音釋例》（《社會科學》[蘭州]1982年第3期）、張傳曾《敦煌變文的破讀字例》（《語言研究》1983年第1期）、張金泉《敦煌變文假借字譜》（《杭州大學學報》1984年增刊）、龍晦《唐五代西北方言與卜天壽〈論語〉寫本》（《考古》1972年第6期）、《〈敦煌歌辭總編〉校音》（《敦煌研究》89.2）、李正宇《敦煌方音止遇二攝混同及其校勘學意義》（《敦煌研究》90.4）、黃征《敦煌俗音考辨》（《浙江社會科學》93.4）等文章則討論了敦煌文獻在字音和方言方面的特點和校勘學意義。

在唐代音注材料搜集整理方面，[日]大島正二《唐代字音的研究》（汲古書院1981）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全書分資料篇和研究篇，收集唐代對《漢書》《後漢書》《史記》《晉書》《禮記》《急就篇》等書的音註材料分音系加以研究，對音系中反映的聲類、反切構造以及唐代語音的演變等做出了研究。而張金泉、許建平出版了《敦煌音義彙考》（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則從各種敦煌文獻中採取有音必錄的原則，鈎沈輯佚，得643件敦煌音義寫卷，經過考辨異文、俗字，糾錯刪重、考定其分合，利用《廣韻》對勘讀音，類并綴合，彙集成除韻書寫卷外的敦煌音義書和注音寫卷三十三種，分列為四部書音義、字書音義、佛道經音義三大類，是研究敦煌俗字音的重要資料。

這方面的文章還有姜亮夫《智塞〈楚辭音〉跋》（《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許建平《唐寫本〈禮記音〉考》（《敦煌研究》91.2）、劉燕文《敦煌寫本〈字寶〉〈開蒙要訓〉〈千字文〉的直音、反切和異文》（《語苑擷英》北京語言文化大學1998）等。

## (五) 對音譯音研究

### 梵漢對音

羅常培《知徹澄娘音值考》(《史語所集刊》第3本第1分, 1931)、《梵文顎音五母之藏漢對音研究》(《史語所集刊》第3本第2分, 1931)從對音的角度提出中古舌上音不是舌面音的觀點, 對後來這方面研究甚至上古音研究都起到推動作用。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季羨林《浮屠與佛》(《史語所集刊》1947第20本下)、《論梵文  $ṭd$  的音譯》(《印度古代語言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等, 但研究範圍不限在唐代。

[日]水谷真誠《Brāhmī 文字轉寫〈羅什譯金剛經〉的漢字音》(《名古屋大學文學部十周年紀念論集》1959)、張清常《唐五代西北方言一項參考材料: 天城體梵書金剛經對音殘卷》(《內蒙古大學學報》1963年第2期)在梵漢對音方面作了進一步地探索, 是50-60年代這方面研究中討論唐代的少數文章中的代表。

進入80年代後, 徐通鏘、葉蜚聲寫了《譯音對勘與漢語的音韻研究》(《北京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總結譯音研究對漢語音韻研究的影響和方法問題, 是有一定理論性的文章的代表。而施向東《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語言研究》1983年第1期)、

聶鴻音《慧琳譯音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1期)、劉廣和《唐代八世紀長安聲紐》(《語文研究》1984年第3期)、《試論唐代長安音重紐: 不空譯音的討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87年第6期)、《唐代八世紀長安音的韻系和聲調》(《河北大學學報》91.3)、《大孔雀明王經咒語義淨跟不空譯音的比較研究》(《語言研究》1994年增刊)、《〈圓明字輪四十二字諸經譯文異同表〉梵漢對音考訂》(《中國人民大學學報》97.4)、儲泰松則有《梵漢對音概說》(《古漢語研究》95.4)和《梵漢對音與中古音研究》(《古漢語研究》, 98.1)等文章是在繼承俞敏先生梵漢對音研究的方法的基礎上做出的關於唐代語音的研究。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例如[美]柯蔚南例如《義淨梵漢對音探討》(《語言研究》91年第1期)、《早期西北方音研究》(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JCL Monograph, No.3.)、《僧伽婆羅的〈大孔雀明王經〉譯音》(Notes on Sanghabhara's Mahāmāyūri Transcriptions CLAO)、《唐代西北方言聲母系統》(Notes on the Initials of a Northwest Dialect of Tang Times, Procee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86.)、《唐代西北方言韻母系統》(Notes on the Finals of a Northwest Dialect of Tang Times 《史語所集刊》59本3分)等等。柯蔚南的研究涉及面較廣, 成果中有許多中國學者沒有注意到的問題。

此外根唐代有關的梵漢對音的文章主要還有李維琦《從〈大唐西域記〉漢譯梵音看作者的語音(聲母部分)》(《古漢語研究》88.1)、麥耘《利用梵漢對音構擬〈切韻〉遇流二攝元音》(《語言研究》91增刊)、陳雲龍《梵漢對音中來紐對譯  $ṭ ṭ ḍ ḍ$

現象再探》(《古漢語研究》92.3),等等。

饒宗頤《唐以前十四音遺說考》(《中華文史論叢》87年第一輯)、《鳩摩羅什〈通韻〉箋》(《敦煌語言文學論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88)、《論悉曇異譯作“肆曇”及其入華之年代》和《北方澤州慧遠所述之悉曇章》(皆載于《梵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93)雖然不是唐代音的討論,但所作的專門考訂工作對梵漢對音研究有重要的意義。

另外,朱慶之《佛典與漢語音韻研究:20世紀國內佛教漢語研究回顧之一》(《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二輯,巴蜀書社2000)是二十世紀這方面最後一篇總結性的文章。

### 漢藏對音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言》(史語所1933)是利用譯音對勘的方法研究中古語音的最早的重要成就。該書根據漢藏對音《千字文》殘卷、《大乘中宗見解》殘卷、藏文譯音《阿彌陀經》殘卷、《金剛經》殘卷、《唐蕃會盟碑》拓本等材料 and 《開盟要訓》中的注音,和現代蘭州、平涼、西安、三水、文水、興縣等地的方言,考證唐五代的西北方言。

[日]高田時雄出版了《漢語史研究:敦煌資料中所見的九、十世紀河西方言》(創文社88),利用過去沒有公布、研究過漢藏對音的材料,對羅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言》作了補充和糾正。[日]池田巧《漢藏對音資料P.T.1228所見的中古漢語河西方言韻尾的對音》(《中國語學》236,1989)專門對韻尾的問題作了研究。

臺灣方面有盧順點《論晚唐漢藏對音資料中漢字齟化情形》(《大陸雜誌》81卷5期90)等文章。

略。

### 域外漢字音

日本、朝鮮、越南語漢字音的研究除了《中國音韻學研究》等著作中的討論外,這方面也有些不少文章,其中關於日語吳音、漢音的最多,例如張世祿《從日本譯音研究入聲韻尾的變化》(《歷史語言所周刊》第9集第99期1929)、洪篤仁《萬葉假名與廣韻對照》(《廈門大學學報》1963年第1期)、曲翰章《通過日語漢音看假名五段與漢字四等的關係》(《中國語文》1982年第5期)楊春霖、李懷墉《現代漢語聲母和日語音讀(吳音、漢音)對應關係的研究》(《音韻學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84)、姚彝銘《日語吳音漢音和中古漢語語音》(《古漢語研究論文集》[二]北京出版社1984)、史存直《日譯漢音、吳音的還原問題》(《音韻學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1986)、王吉堯和石定果《漢語中古音系與日語吳音漢音系對照》(《音韻學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1986)、王吉堯《從日語漢音看八世紀長安方音》(《語言研究》87.2)、李慶祥《試論日語漢字讀音中的吳音、漢音、唐音和慣用音》(《山東大學學報》90.3)、夏瑞華《日譯漢字音與〈切韻指掌圖〉聲母對照》(《鎮江師專學報》90.3)、黃華《論現代越語中的漢越詞》(《現代外語》90.3)、孟憲仁《日語音讀與古漢語音韻》(《現代日本經濟》91.2)、袁慶述《部分中古入聲字讀音與日語漢字音讀的對應關係》(《古漢語研究》93.1)、晉學新《論古漢語音韻對日語的影



響》(《四川外國語學院學報》96.3)、李月松《從漢語中古音看日語吳音語漢音之差異》(《外國語》96.4),這些研究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

在朝鮮漢字音研究方面也有一些較新的成果,例如鄭仁甲《朝鮮語固有詞中的“漢源詞”試探》(《語言學論叢》第十輯,商務印書館)、《朝鮮語漢字詞音系考》(《語言研究》1998年增刊)、朴恩用《韓國嶺南方言漢字四聲研究》(《韓國學報》7卷88)、楊人從《韓國漢字音之誤讀》(《韓國學報》8卷89)吳世峻《從朝鮮漢字音看一二等重韻問題》(《聲韻論叢》第四輯1992)等朝鮮漢字音的研究。一些研究超出了唐代的範疇,從略。

越南漢字音研究出了早期外國學者的研究之外,王力的《漢越語研究》(《嶺南學報》第9卷第1期,1948)是這方面的力作。而日本三根谷徹的《越南漢字音研究》給這方面做出了探討做出了有分量的補充。

### 其他對音材料

略(這方面李範文出版了《同音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86),《宋代西北方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94),對骨勒茂才《番漢合時掌中珠》的西夏語漢語對音材料作了全面的研究。聶鴻音《論契丹語中漢語借詞的音系基礎》(《民族語文》1988年第2期)、《番漢對音簡論》(《固原師專學報》92.2)和《女真文中漢語借詞的音韻特點》(《固原師專學報》93.4)、喻捷《略談漢語中的突厥語借詞》(《中央民族大學學報》94.2)、張竹梅《從西夏語看中古濁音送氣與否》(《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96.2)、孫宏開《西夏語鼻冠音聲母構擬中的幾個問題:從〈掌中珠〉西夏語漢字注音談起》(《民族語文》96.4),等等文章利用不同的對音和借詞材料研究當時的漢語語音,不少地方跟唐五代方音作了比較)。

## (六) 詩詞文用韻研究

### 用韻考

最早用韻研究是為上古音研究服務的,即是處理唐代用韻材料也是這樣(諸如《唐韻正》)。1930年代中期以後,一些學者開始注意中古用韻的研究,于安瀾《漢魏六朝韻譜》(1936)、王力《南北朝詩文用韻考》(1936)幾乎同時問世,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科學出版社1958)給對中古音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唐代用韻研究也因此開始用於唐音的探究。

唐詩用韻研究的成果相當多,例如張世祿《杜甫詩的韻系》(《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第2卷第1期,1944)、《杜甫與詩韻》(《復旦學報》1962年第1期)、唐作藩(若凡)《寒山子詩韻(附拾得詩韻)》(《語言學論叢》1963年第5輯)、[加]蒲立本《李賀詩的用韻》(《清華學報》7卷1期,1968)、鮑明煒《李白詩的韻系》(《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白居易元稹詩的韻系》(《南京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唐代詩文韻部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趙銳《白居易的詩歌用韻》

(《北方論叢》1980年第5期)、《元稹的詩歌用韻》(《漢語論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荀春榮《韓愈詩歌用韻》(《語言學論叢》第九輯,商務印書館1982)荀春榮《韓愈的韻文用韻》(《語言學論叢》第十五輯,商務印書館1988)、李維一、曹廣順、喻遂生《初唐四傑詩韻》(《語言學論叢》第九輯,1982)、張文軒《從初唐“協韻”看當時的實際韻部》(《中國語文》1983年第1期)、馬重奇《白居易詩用韻研究》(《福建師大學報》1984年第1期)、耿志堅《唐代近體詩用韻通轉現象之探討》(《中華學苑》1984年29卷)、《初唐詩人用韻考》(《語文教育集刊》1987年第6期)、《中唐詩人用韻考》(《聲韻論叢》第三輯1991)、《晚唐及唐末五代僧侶詩用韻考》(《聲韻論叢》第四輯1992)、萬西康《從李賀詩歌用韻看中唐語音的演變》(《杭州師專學報》1984年第2期)、趙長勝《試從杜甫押入聲韻的諸詩篇探討唐代入聲的演變》(《牡丹江師院學報》1984年第2期)、國赫彤《白居易的詩歌用韻》(《漢語論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王碩荃《杜詩入聲韻考》(《杜甫研究學刊》成都,1988年第2期)、王小莘《王維詩韻》(《廣西大學學報》89.3)、林仲湘《杜牧詩文用韻考》(《廣西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馬重奇、李慧《韓愈古詩用韻考》(《陝西師大學報》1990年第1期)、師爲公和郭力《沈佺期、宋之問詩歌用韻考》(《鐵道師院學報》90.2)、顧黔《杜荀鶴詩用韻考》(《天津師大學報》1990.3)、程垂成《從白居易諷喻詩的用韻看元和魂痕分用的現象》(《河北大學學報》91.2)、李無未《韋應物詩韻系》(《延邊大學學報》1994.2)、馮志白《劉禹錫詩文用韻考》(《語言研究》1996增刊)、郭力《孟郊詩韻考》(《語言研究》1996增刊)、宋秉儒《杜牧詩韻考》(《語言研究》1996增刊)、郭娟玉《李賀詩韻與詞韻》(《大陸雜誌》95卷第1期,1997)、劉曉南《唐宋近體詩的語音依據與語料價值》(《古漢語研究》1999年第1期)、[韓]朴柔宣《李賀詩歌用韻與中唐洛陽韻系》(《語言研究》1998年增刊)、《李商隱詩歌用韻研究》(《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一屆學術討論會、漢語音韻學第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等等。另外,鮑明煒《唐代詩文韻部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90)是一部研究初唐時期詩文用韻的專著,分攝列出韻譜,最後附以《初唐詩文的韻系》(曾發表在《音韻學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1986)作結,展示了初唐詩文用韻的整體面貌。這樣上連周祖謨魏晉齊梁韻部研究和李榮《隋韻譜》,整個中古前期的韻的情況就基本清楚了。金恩柱《從唐代墓誌銘看唐代韻部系統的演變》(《古漢語研究》1999年第4期)及其博士論文《唐代墓誌銘用韻研究》(中山大學1998)則從碑銘文獻中來研究用韻。

在利用唐代俗文學用韻材料方面也有一些成果,例如羅宗濤有《敦煌變文用韻考》(臺灣衆人出版社1969)、周大璞《敦煌變文用韻考》(《武漢大學學報》1979年第3、4、5期)得唐五代敦煌方言用韻23部,入聲消失,濁上變去。張金泉《敦煌曲子詞用韻考》(《杭州大學學報》1981.3)、《敦煌俗文學中所見的唐五代西北方音韻類》(《敦煌學論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錢學烈《寒山詩韻部研究》(《語文研究》1984年第1期)、張鴻勳《敦煌講唱文學韻例初探》(《敦煌研究》試刊第二期,1983)、劉麗川《王梵志白話詩的用韻》(《語言論文集》第二輯,中國人民大學

1984)、都興宙《敦煌變文韻部研究》(《敦煌學輯刊》1985年第1輯)、《王梵志詩用韻考》(《蘭州大學學報》1986.1)、林炯陽《敦煌寫本王梵志詩用韻研究》(《東吳文史學報》9卷,1991)、張鴻魁《王梵志詩用韻研究》(《隋唐五代漢語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蔣冀騁《王梵志詩用韻考》(《敦煌吐魯番研究論集》,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張美蘭《皎然詩用韻考》(《語言研究集刊》第5輯,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等等,都是通過敦煌俗文學作品的用韻和用字(假借)情況來考察當時的語音實際。在俗文學和方言方面,周祖謨的《唐五代的北方語音》和《敦煌變文與唐代語音》(皆載《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周祖謨《變文的押韻與唐代語音》(《語言文字學術論文集》知識出版社1989)對中古後期的語音材料、押韻情況及其跟韻書的差異作了概述。

隨著現代電腦科技的發展,開始出現利用為用韻研究專門設計的軟件來處理用韻材料的成果,例如陳海波、尉遲治平《五代詩韻系略說》(《語言研究》1998年第2期)、胡傑、尉遲治平《詩文用韻的計算機處理》(《語言研究》1998年增刊)、劉根輝、尉遲治平《中唐詩韻系略說》(《語言研究》1999年第1期)、趙蓉、尉遲治平《晚唐詩韻系略說》(《語言研究》1999年第2期)就是在這方面的成果。

### 用韻和其他

用韻考除了探索唐代音系的韻部總體面貌之外,還有探索其他方面內容的成果。

考證聲調問題的如史存直《唐七家詩中的“陽上作去”現象》(《說文月刊》第68期,1948)、池曦朝、張傳曾《白居易詩歌韻腳中的“陽上作去”現象》(《語言論叢》第一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居思信《是“濁上變去”還是“上去通押”:與池曦朝、張傳曾兩同志商榷》(《齊魯學刊》1982年第5期)、馬重奇《從杜甫是用韻看“濁上變去”問題》(《福建師大學報》1982年第3期)、賴江基《從白居易是用韻看“濁上變去”》(《暨南學報》1982年第4期)、國赫彤《從白居易詩文用韻看濁上變去》(《語言研究》1994增刊)、《從白居易詩文用韻中的異讀字看唐音別義》(《語言研究》96增刊)、金周生《韓愈詩文“濁上變去”例再補正》(《輔仁學誌》1998)等。還有其他的一些如周長楫《從義存的用韻看唐代閩南方言的某些特點》(《語言研究》1994增刊)、居思信《從唐詩中江韻字的押韻看到的一個問題》(《齊魯學刊》1981年第2期)、銳聲《聲不失序,音以律文:杜甫《石壕吏》用韻闡微》(《天津師大學報》87.6)等等。

## (七) 早期韻圖研究

略。

## (八) 中古音系研究

中古語音可以分成前後兩期來研究，唐代處於這兩個時期的中間階段，因此中古音系的研究也包括《切韻》因襲的構擬。王力《漢語語音史》把整個漢語史分成九個階段，其中隋-中唐為一個階段，晚唐五代為另一各階段。

### 1. 中古音系研究的專門著作

現代意義的中古音系研究，使中西方音韻學研究方法結合的產物。上世紀初，商克、馬伯樂（H. Maspero）、伯希和等人對中古漢語語音做過一些研究，但是並不系統。在這方面，影響最深遠並在漢語現代音韻學界首開風氣的是瑞典高本漢（B. Karlgren），他利用《廣韻》反切、韻圖等資料，根據現代漢語方言和外域譯音，第一次全面地構擬出他認為是唐代長安音的中古音系統，其《古代漢語》（1915）、《現代方言描寫語音學》（1916）、《歷史上的研究》（1919）在1926年連同《方言字匯》合編成《中國音韻學研究》一書，錢玄同在1920年代就採用為北京大學的講義，1931-1936年由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1940商務印書館出版。李榮《切韻音系》是成於1945年的學位論文，1952年中國科學院出版時將其中的單字音表改用《王三》重寫，首次對《王三》的反切系統作了全面的考察，利用各種語音材料在音類考察和音值構擬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見解，對高本漢的構擬提出了很多修訂。邵榮芬《〈切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比較了《王三》和《廣韻》的異同，也利用各種材料對《切韻》音系作出了新的構擬。

國外學者這方面貢獻也很大，日本自有坂秀世以後，有藤堂明保《中國語音韻論》（光生館1980改訂版）、平山久雄、三根谷徹等人的研究，其中橋本万太郎（Mantaro J. Hashimoto）《古漢語音韻》（*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Study of Languages & Cultures of Asia & Africa Monograph Series No.10-11*）用生成音系學理論、八思巴對音資料進行擬測，跟大部分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的研究有較大的不同，但是很有影響。加拿大蒲立本（E. G. Pulleyblank）《中古漢語》（*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4）的語音表述方式更是不同於一般學者，其中有許多精辟的見解為學者們所注重。

90年代以後，黃典誠《切韻綜合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94）分十個專題介紹和討論了《切韻》的性質、重紐、擬音、《切韻》系韻書對《切韻》的改易、對韻圖的影響等問題，還和《博雅音》作了比較，書後附錄的《〈切韻〉的異讀：反切異文類聚》以《王三》反切為藍本，校以敦煌王韻、《切三》、《廣韻》等，依聲母、韻母、聲調分別列出了反切的又音材料。黃笑山《〈切韻〉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統》（文津出版社1995）把的前一部分是對《切韻》音系的構擬，注重音類和擬音的一致，提出了一些跟前賢不同的但未必成熟的觀點。

## 2.中古音系研究的重要論文

### (1) 綜合討論

略。

黃淬伯《討論〈切韻〉的韻部和聲紐》(《史語所周刊》第6集第61期1928)

徐通鏞、葉蜚聲《歷史比較法和〈切韻〉音系的研究》(《語文研究》1980年第1期)

李榮《〈切韻〉與方言》(《方言》1983年第3期)

潘重規《龍宇純英倫藏敦煌切韻殘卷校記拾遺》(《華岡文科學報》15卷1983)

鄭張尚芳《中古音的分期與擬音問題》(《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一屆學術討論會、漢語音韻學第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 (2) 聲母問題

略。

關於聲類和聲母的音值問題，羅常培《廣韻聲紐的討論》(《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4期，1927)較早進行了討論，陸志偉《證廣韻五十一聲類》(《燕京學報》25期1939)用數理統計的方法對《廣韻》反切上字的系聯加以驗證，其旨趣在“充補系聯法之不足”，其價值在於它給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帶來了新的方法。陸志偉《三四等及所謂“喻化”》(《燕京學報》26期1939)認為高本漢的喻化理論只能說明三等韻和一二等的區別，與三四等的主要區別實不相干。

其他略。

[日]水谷真誠《唐代漢語鼻音聲母的非鼻音化進程》(《東洋學報》第39卷第4號，1957)

李新魁《論〈切韻〉系統中床禪的分合》(《中山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

葛毅卿、葉祥苓《喻母古音值》(《南京師院學報》1981年第3期)

潘悟云、朱曉農《漢越語和〈切韻〉唇音字》(《語言文字研究專輯[上]1982)

潘悟雲《中古漢語輕唇化年代考》(《溫州師院學報》1983年第2期)

王力《論日母的音值：兼論普通話的聲母表》(《中國語文》1983年第1期)

胡先澤《影母考》(《社會科學戰綫》1983年第2期)、《喻母考》(《東北師大學報》1984年第1期)

閻玉山《等韻“門法”中的“類隔”切語：兼論〈切韻〉音系中舌音的分合》(《東北師大學報》1984年第1期)

金有景《論日母：兼論五音、七音及娘母等》(《羅常培紀念文集》商務印書館1984)

喻世長《切韻聲母擬音的新嘗試》(《羅常培紀念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84)

都興宙《中古知系聲母的擬音問題》(《蘭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

林炯陽《論曾運乾切韻五十一紐說》(《中華學院》33卷1986)

張世祿、楊劍橋《漢語輕唇分化問題》(《揚州師院學報》1986年第3期)

謝云飛《中古敷微二字母之音值再擬測》(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1986)

李國華《論中古時期全濁聲母送氣問題》(《雲南教育學院學報》1987年第3、4期)

龍異騰《從唐代史書反切看輕重唇的分化》(《漢語史研究集刊》一, 1998)

**(3) 介音問題 (略)**

略。

**(4) 韻和韻母 (略)**

**(5) 重紐問題 (略)**

羅偉豪《略論過去音韻學上一些審音的問題: 有關切韻的“重紐”問題及其他》(《中山大學學報》1962年第3期)

李新魁《重紐研究》(《語言研究》1984年第2期)

周法高《隋唐五代宋初重紐反切研究》(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1986)

龍宇純《論重紐等韻及其相關問題》(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1986)

沈小喜《中古漢語重紐研究》(《語言學論叢》第二十二輯, 北大中文系, 1999)

**(6) 聲調問題 (略)**

周法高《說平仄》(《史語所集刊》第13本, 1948)

梅祖麟《中古漢語的聲調與上聲的起源》*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30, 1970)、《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中國語文》1980年第期)、《說上聲》(《清華學報》新14卷1、2合刊, 1982)

楊耐思《北方話“濁上變去”來源試探》(《學術月刊》1958年第2期)

丁邦新《平仄新考》(《史語所集刊》第47本第1分, 1975)、《漢語聲調源於韻尾說之檢討》(《漢學會議論文集》1981)、《吳語聲調之研究》(《史語所集刊》第55本第4分, 1984)、《漢語聲調的演變》(《第二屆漢學會議論文集》1989)

楊其群《試論韓愈〈諱辨〉涉及的四聲問題》(《山西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許寶華《論入聲》(《音韻學研究》第一輯, 中華書局1984)

邢公畹《說平聲》(《音韻學研究》第一輯, 中華書局1984)

宗福邦《論入聲的性質》(《音韻學研究》第一輯, 中華書局1984)

平山久雄《江淮方言調值構擬和北方方言祖調初探》(《語言研究》1984年第1期)、《日僧安然〈悉曇章〉裏關於唐代聲調的記載》(《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三聯書店1987)

丁大林《說去聲》(《昆明師專學報》1984年第1期)

劉保明《〈諱辨〉濁上變去例補證》(《中國語文》1986年第4期)

尉遲治平《日本悉曇家所傳古漢語調值》(《語言研究》1986年第2期)

王士元《聲調發展方式一說》(劉村漢、張文軒譯,《蘭州學刊》1987年第5七)

魯啓華《對〈切韻〉四聲八調說的再探討》(《鐵道師院學報》1988年第1期)

沙加爾《論去聲》(郭建榮譯,《語文研究》1988年第3期)

廖名春《從吐魯番出土的別字異文看濁上變去》(《古漢語研究》1989年第1期)

那宗訓《全濁上聲是否均變爲去聲》(《中國語文》1995年第1期)

范新幹《濁上變去發端於三國時代考》(《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二輯,巴蜀書社2000)

### (7) 中古方音(略)

自從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言》發表以來,利用各種材料研究唐代方言就成爲上世紀中古方言研究的一個焦點,這裡只開列這方面的一些重要文章。

#### 唐五代西北方音

龍晦《唐五代西北方音與敦煌文獻研究》(《西南師院學報》1983年第3期)

柯蔚南 W. South Coblin《唐五代西北方音的聲母札記》Notes on the Initials of a North-West Dialect of Tang Times(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會議論文,1986)、《唐代西北方音的韻母札記》(《史語所集刊》第59本第3分,1988)

橋本万太郎《西北方言和中古漢語的軟顎音韻尾》(《語文研究》1982年第1期)

廖名春《從吐魯番出土的別字異文看五至八世紀初西北方音的韻母》(《古漢語研究》1992年第4期)

李如龍、辛世彪《晉南、關中的“全濁送氣”與唐宋西北方音》(《中國語文》1999年第3期)

李正宇《敦煌方音止遇二攝混同及其校勘學意義》(《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

#### 唐代長安方音

馬伯樂《唐代長安方音考》(BEFEO, 1920)

尉遲治平《論隋唐長安音和洛陽音的聲母系統》(《語言研究》1985年第2期)

劉廣和《論唐代長安音重組》(《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

金德平《唐代長安話日母讀音考》(《陝西師大學報》1988年第1期)、《唐代長安聲調狀況試探》(《陝西師大學報》1989年第4期)

#### 唐五代其他方音

羅常培《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史語所集刊》第2本第3分,1931)

周祖謨《唐五代的北方語音》(《語言研究論叢》第十五輯,1988)

聶鴻音《近古漢語北方話的内部語音差異》(《學術之聲》第3輯,北京師大1990)

儲泰松《唐代的吳音和秦音》(《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一屆學術討論會、漢語音韻學第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丁治民《唐五代燕幽方音考》(《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第十一屆學術討論會、漢語音韻學第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趙振鐸《唐人筆記裏的方俗讀音(一)》(《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二輯,巴蜀書社2000)